

博士生返乡笔记走红,“知识的无力感”引争议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疯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没想到,就是这些在他眼里看似普通的乡村生活见闻,却触动了一大批读者,在春节返乡之际引发了人们对乡土的思考。许多网友用“感同身受”四字评价,但也有人指出返乡笔记有“美化”嫌疑。

此文也让中国农村的现状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并收获诸多回应,有肯定的声音,也有争议之声。日前,一篇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在澎湃新闻网上发布,以另一位来自乡村的文科博士生的视角看乡村。“古鱼”对农村大学生“近年情更怯”的现象表示不认同,在他看来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读书不会无用,因为知识是有用的,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以后贡献越大,拿钱也就越多,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人上人”的身份优越感。

对此,王磊光回应,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

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本来读书出来是应该有所为的,回到家乡却不能做什么。”

王磊光的这篇笔记获得了他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王晓明表示:“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求学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似乎越来越像上世纪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把您认为值得一读的文章发送到本栏目微信号“晨报网摘”(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即可和万千读者分享。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儿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3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5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人说:“不管怎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人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月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人说:“能找个月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10年没有回家了。有一天他突然在QQ里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儿,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儿,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缘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在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在外打工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自打工潮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20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祭祀的习俗,在特定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

人,也会赶回老家给祖宗上坟。

(3)葬礼。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社会学者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就相互串门、集体上街游玩等。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儿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到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6万到8万元,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500元,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进行了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20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要考虑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率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除夕,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菟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

下面给大家看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下转13版)

回家的交通

10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4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个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时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坐票,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地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七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了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水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当老师。

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硬座,我就是去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

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虽然农民工很多,但很多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儿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的、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会打扰到别人。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

